

印度加爾各答的客家移民

潘美玲*

摘要

本文探討印度加爾各答的客家人移民歷史與身份變遷，是一個從移民過程到形成少數族群的發展過程。根據相關的文獻資料與田野調查，呈現客家人移民印度加爾各答的遷移、定居到再度遷移的現象，其中包括從移工、政治難民到國際移民的過程，以及作為被印度社會隔離與被種族化的「他者」之隱形的族群，到積極呈現為多元社會的文化少數族群的轉變，說明客家人從過客到定居而成為印度社會少數族群的歷史過程與機制。

關鍵字：加爾各答、塔壩華人、中國城、少數族群、海外客家人

*單位職稱：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通訊地址：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聯絡電話：035-712121 轉 58049

e-mail：mlpan@mail.nctu.edu.tw

本文為 96 年度客委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發展推動計劃案項下之子計畫：「從他鄉到故鄉：印度加爾各答 Tangra 客家社群的變遷與存續」的部分成果。本文部分曾發表於第二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客家的形成與變遷」2008 年 12 月 20-21 日，主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暨國際客家研究中心。

收稿日期：2009/02/12 接收刊登日期：2009/08/05

Hakka Diaspora in Calcutta, India

Mei-Lin Pa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Hakka Diaspora in Calcutta, India by focusing on the migratory process and the form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The formation of Tangra Chinese has its historical path from immigrant workers, refugees and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and should be studied in different Indian institutional context, such as imperial colony, nation-state building, caste society, and market economy. The diaspora Hakka in Calcutta provides the complex history of global migrations of populations, the stigmatization and oppression of minorities by modern state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an ethnic minority as an integral part of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society.

Key words: Calcutta, Tangra Chinese, Chinatown, ethnic minority, Hakka Diaspora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一、前言

「海水所到之處，就有華僑，有華僑就有客家人」，印度也不例外，加爾各答是印度華人也是客家人聚居最多的地方，歷經幾代的定居這些大多來自中國廣東梅縣的客家人在地發展成爲「塔壩華人」(Tangra Chinese)，然而相關的文獻資料卻相當有限。海外各國別的離散華人或客家聚落研究，對台灣的學者而言仍是一個正在開拓的領域，東南亞地區因爲地理接近、客家移民人數以及與台灣貿易接觸的歷史較容易成爲研究的對象。印度因爲地處更遠的南亞，地廣人稠加上被英國殖民兩百年的歷史經驗，使得這個充滿神秘色彩的文明古國與華人的關係，除了歷史記載著法顯到天竺取佛教經典的故事之外，似乎很難聯想到印度已有長達兩百多年的以客家人爲主的華人聚居社群。

華人移民印度的歷史被忽略的原因在於數量和社會影響層面的邊緣性，也是其特殊性之所在。首先，華人從十九世紀開始大規模地國際性遷徙活動，加爾各答的華人即使人數曾經在 1960 年代達兩萬人以上，相對於在東南亞的越南、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泰國從數十到上百萬的華人數目相比，不論是人口的總數或與在地人口所佔的比例而言，都是不成比例的少數(李恩涵 2003: 5)，且隨著華人的遷離，在印度華人的數目還在持續地減少，處於人口達 10 億以上的印度社會當中更如滄海一粟般的微小。此外，印度的華人也沒有像東南亞華人掌握著該當地社會經濟的重要資源成爲社會的主流，影響度不高也使得能見度相對很低，甚至到被忽略的程度，因此在印度的歷史文獻直接有關加爾各答華人的資料相當零星有限，直到 2007 年 12 月 *China Report* 專刊合輯，印度的學界才開始注意到印度境內已經有兩百年歷史的華人社群。*China Report* 於 1965 年創刊，主要針對中國及東亞各國事務的研究季刊，是印度學界對中國事務討論的一個平台。至於對印度境內的華人研究卻是四十年來的第一次，根據主編 Tansen Sen 的說法，應該是 1962 年中印戰爭¹以及華人所受到印度政府對待的關係，使

¹ 1950 年獨立後的印度和中國原是兄弟之邦的情誼，但當 1950 年中共進入西藏之後便因爲中印邊界的劃定產生衝突，1959 年印度接受西藏宗教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和大量難民在達蘭薩拉(Dharamsala)成立流亡政府，當時的總理 Nehru 曾要收復過去英國人宣稱屬於印度領土卻由中國人佔領的 Kashmir 的 Aksai Chin 地區未果，三年之後，中國爲報復而入侵到印度的 Assam 平原，印度軍隊寡不敵眾而潰敗，也失去了包括 Ladakh 的部分領土，入侵印度十天之後，中共自行停火並撤回相當距離，雙方雖然停止戰爭但是邊界紛爭未決，並分別派重兵在邊界駐哨(Majumdar et al. 1981:1556-1558)，中印的邊界談判到現在還時常舉行。

得這個議題對於中國或是印度的學者而言，政治上相當敏感，因此目前已經出版有關這個社群的學術著作都是歐美的學者(Berjeaut, 1999; Oxfeld, 1993)。當然在這個時間點上有這本合輯，正是中國開始經濟崛起，印度試圖超越過去中印戰爭的陰影，與之建立友好的關係，開始重新檢視兩國之間的時機，在印度加爾各答的華人成為這個新歷史連結的焦點。

然而印度加爾各答的華人受到注目的此時，此地的華人卻大量移民他國，使得塔壩(Tangra 或 Dhapa)成為這些移居海外客家人的僑鄉。從公元兩千年開始出現報導加爾各答華人聚集所在的塔壩地區以及數十年來賴以維生的皮革業，因為印度政府最高法院以污染環境理由而裁決搬遷的命令，似乎已經到了要熄燈走人的階段(Dhar, 2000; Karkaria, 2004; Observer, 2004)。但即使意識到這種變遷的趨勢，塔壩地區的客家人卻表達了希望長久居住在當地決心與意志，希冀能夠打破輪迴似的「他鄉作客」命運。公元 2005 年大家集資作了一個中文寫著「塔壩中國城」，英文“Tangra China Town”加上印度文和孟加拉文的大塊看板放在社區的入口處，指示著進入塔壩的方向；這個舉動突破了過去客家人為主的華人社群在印度社會的隔離與邊緣處境，而將自己再現並呈現在印度社會的文化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y)存在的具體事實。

移民他鄉的生活注定受到原鄉與移居地的影響與建構，兩個社會個別的變化、變遷，以及兩個社會間的和諧或敵對關係，都對於移民「作為甚麼人」或「自我認定」(self-definition)的族群認同，或「被視為是哪種人」的「他者指定」(other-definition)身份認定產生影響，「他者指定」所指的是被主流社會團體透過排除或邊緣化的過程所構成附屬的族群地位，「自我認定」指的是該群體透過共同的語言、歷史與文化的經驗基礎，形成共同屬於一個社群的集體意識(Castles and Miller, 2003:32-48)。兩種認定分別或同時在不同的歷史與社會脈絡當中，對移民的生活產生作用，也反映在客家人移民印度加爾各答的歷史過程當中。

本文將針對客家人與其他華人群體移民印度加爾各答的遷移現象，從國際移工、政治難民與國際移民的過程身份變遷，分析客家人從過客到定居而成為印度社會少數族群的過程。然而這裡早期客家移民的一手歷史文獻非常欠缺，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和東南亞及其他海外的華人移民社群相比，人數實在微不足道。另

外，也許受限於移民者當時所屬勞動階層與戰亂的時代，該社群並沒有系統性地保留文獻及書寫移民的歷史，研究者在當地從事訪談的過程，也發現受訪者對於其家族的移民歷史所知非常有限。直到最近才開始有當地華人出版的資料，分別是 Liang (2007) 訪談耆老的口述歷史所提供移民類型和職業的資料，以及個人生活回憶的文學作品(Li, 2006)。至於人口學方面的資料主要根據官方所做的人口普查，一部份來自印度殖民時期的官方調查資料，但這類的資料當中華人之下並沒有區分族群類別，另一部份是臺灣的中華民國僑委會的華僑志編纂委員會在 1962 年所編的《印度華僑志》提供了當時印度「華僑」的基本資料。

人類學家 Ellen Oxfeld Basu 是研究印度加爾各答客家人的先驅，她在 1980 年代曾數次在該地進行田野研究與拜訪，相關的研究作品主要是 1985 年所完成的博士論文 *Limits of Entrepreneurship: Family Process and Ethnic Role Amongst Chinese Tanners of Calcutta*，之後 1993 年又改寫增補出版 *Blood, Swea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全書透過民族誌研究的書寫方式對塔壩地區客家人正值興盛的皮革產業有詳實研究分析，並整理供官方調查的人口資料，但公元兩千年之後產業變遷不在其研究範圍之內，此外 Oxfeld 所處理的這些客家移民身份認同，只觸於所在的印度社會當中，一部分對外與印度人區分的 Chinese 面向，另一部分是對內與其他華人族群區分的「客家人」族群身份，未能檢視移民印度加爾各答的客家人如何與其他客家群體區分，維持其獨特客家本質的特色。本文研究者除了蒐集整理上述相關研究文獻，分別在 2006 年十一月、在 2007 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偕同在當地出生的計畫助理進行在地的田野觀察與深度訪談²，訪談的對象包括當地社團領袖，包括「印華文化發展協會」、「加城華人聯合會」以及「塔壩青年會」，以及從事鞋行、製皮業、餐廳與美容等不同職業對象，也涵括從第一代到第四代移民；地點包括家裡、市場、學校、工廠、餐廳、美容院。研究的過程中牽涉到英文、中文、與客家話的使用，研究者本身使用英文和中文基本的溝通並不困難，因為塔壩的客家人除了客家話以外在學校都有學中文和英文，必要時則透過翻譯協助。2008 年七月中旬到廣東省梅縣與松口鎮實地考察客家人僑鄉。

² 訪談時間、地點與訪談者資料請見附錄一。

二、從移工到移民

(一)、移工：英殖民帝國的服務階層

何以當初客家人會來到加爾各答？當我們從陸地交通的角度來看，廣東到加爾各答地理上並非鄰近，陸路隔著高山峻嶺，水路中間還隔了一個中南半島，但在 1780 年代的世界，碼頭所及的距離就是世界的距離，相對於依賴步行或馬車的陸上運輸，水路運輸不僅簡單、低廉，也更快速，兩個相距遙遠的都市之間的聯繫，要比城市和鄉村之間的聯繫方便，在十八世紀陸路交通並不發達的時代，從香港到印度並沒有想像的遙不可及。其次，加爾各答在 1772 到 1911 年是英屬印度的首府所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對中國的茶葉和絲的需求很高，英國政府為取得財政平衡而對中國輸出鴉片。1773 年英屬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取得鴉片貿易的獨占權，但由於中國禁止運送鴉片的東印度公司船隻，所以在孟加拉生產的鴉片要先在加爾各答出售再運到中國，儘管中國政府一直禁止鴉片入口，又在 1797 年重申禁煙，但公司仍從孟加拉透過貿易商和仲介走私鴉片到中國廣州等地，鴉片貿易在 1824 到 1834 年的十年當中就由 12,639 箱增加到 21,785 箱之多(Marx, 1858)。中印貿易靠鴉片貿易建立了一條海上絲路，使得加爾各答成為中國和印度之間頻繁的港口貿易往來之地，英國殖民者鼓勵人們生產和走私鴉片及其他毒品，以支持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貨物的流通同時也促進了人群的移動，其間就有懷抱發財夢的華人來到這裡。

第一位到加爾各答定居的華人是 1778 年來自廣東的楊大釗(Acchi)或稱安儲(Atchew)，據英國皇家檔案館的報告顯示，大釗向當時英國派駐印度的首任總督 Warren Hasting 租土地開糖廠，並招募華工作為種植甘蔗的勞動力³。雖然楊大釗不見得是真正第一個到印度定居的華人，但他卻是有史料記載的第一人。根據 1837 年加爾各答警察局的人口調查報告顯示，當時這裡有華人 362 人，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南方一些省份的人們為躲避戰亂，紛紛向東南亞和南亞地區遷移，《印度華僑志》(1962: 29)的記載指出 1865 年之後被清廷擊敗的太平軍為了躲避通緝紛紛逃亡海外，而往香港、澳門一帶避難，當時正值英人統治印度開始造船築路與實施種茶的計畫，這些洪楊餘部約三百人遂接受英人雇往印度

³ Oxfeld (1993: 72-73) 書中有史料原文。

的大吉嶺和阿薩密等地築路種茶。到了 1876 年在加爾各答是 805 人(Basu, 1985:24；Oxford, 1993:74-76)。

貿易商和技術工人是當時第一波移民，爲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當時加爾各答正在英國的殖民時期，雖然殖民經濟對印度的工商業造成傷害，但與動盪不安的滿清帝國相比則是治理良好、富庶且充滿機會的國度，「在當時印度一盧比等於十個中國貨幣的價值，1500 盧比可以抵三年在中國的生活費。」(Liang, 2007: 399)。目前在加爾各答經營中餐廳的孫先生回溯家族移民印度的歷史，孫家先人⁴當年並沒有移居印度加爾各答，只是「生意」的往來，據說當時一趟船下來獲利頗豐，要以鹹魚掩飾滿載黃金回中國⁵，雖然現在已經無法查證這種海上貿易的實況，卻可由此家族口傳歷史中，一窺滿清末年亂世之時，生計難度的人民賦予加爾各答的想像和希望。

當時到印度的華人大都是隻身的男性，抱著移工的心態，賺足夠的錢回鄉，並未有長久居留的打算。除了從事貿易走私的商人之外，工匠包括木匠和鞋匠，由於印度人受到殖民剝削時有反抗，使得統治印度的英國殖民者對被其殖民的印度人民無法完全信任。華人木工的勤勞誠信贏得了英國顧客的心，又加上擁有優良的工藝品質，於是從提供了英國殖民統治者的服務找到生存的利基。

在加爾各答的木匠主要在港口的船塢從事木工，也有些木匠甚至直接到英國人家製造家具，也有些到位於大吉嶺和阿薩密的茶園從事製造茶箱及建築茶工宿舍的工作，因此有些華人遷移到印度的東北部。鞋匠也是供應給英國人手工訂製的皮鞋，雖然集中在現在的加爾各答中部的 *Bentinck Street*、*Phears Lanes* 和 *Rabindra Sarani* 周圍的區域，但並非定居的型態，而是每天拼命工作 14 到 15 小時，半年之後賺夠了錢，回到中國與家人團聚，留下的攤位就由其他的華人接續，大家就這樣輪流工作、回鄉，當然也吸引了更多華人同鄉到這裡尋找機會，1901 年的華人就增加到 1,640 人(Oxford, 1993:74)。因爲製鞋使用的是皮革原料，屬於印度教的低賤階層的工作，以廣東人居多的華人所聚居之處是現在的靠加爾各答城市中部的 *Bowbarzar*，現又稱舊中國城區，靠近穆斯林地區而遠離孟加拉人與

⁴ 孫家先人在道光 21 年（西元 1841）在當地組織了忠義堂會館，這個組織還包括現在的梅光學校現址（外面是忠義堂的門匾），天后宮和老人館，以及忠義山莊是華人死後埋葬之處。

⁵ 訪談記錄十三。

印度教徒的區域，因為越是嚴格素食者所在的地區越不願意提供葷食的華人居住 (Liang, 2007)。

(二)、戰爭難民到移民：職業的階層化與族群分化

從 1911 年到 1961 的五十年間，有兩波移民潮都來自於中國內部的戰亂，第一波是 1911 到 1930 年間從滿清帝制被推翻建立民國，之後軍閥割據、國共內戰、日人侵華的動盪階段；第二波則從 1949 年二次戰後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展開階級革命社會清算，為避戰亂和共產黨清算而逃到印度的難民，加上原來就在印度打工的華人家屬過來投靠依親。有別於過去都是男性工匠的短期移工，這個階段的移民增加了婦女與小孩，以非技術工人者居多，並打算在印度長期居留，此時加爾各答的華人尤其是來自於廣東梅縣的客家人從兩千人增加到將近一萬五千人。

除了從事走私或販賣鴉片的人有暴利可圖之外，這一批戰爭難民在陌生的國度舉目無親，又多無一技之長，只能靠著同文同種的華人求得溫飽幫忙尋找住宿和工作的地方，開始擔任木匠和鞋匠的學徒，洗衣服、釀酒賣酒、裁縫、或在市場賣菜等僅供溫飽的服務，尤其婦女和小孩都得打零工或賣零食，例如今年 80 多歲的藍老太太當年因為丈夫先到加爾各答從事理髮工作，她為避戰亂而來投靠，為了養家活口，除了在同是客家人的皮廠幫忙曬皮之外，還要賣小吃貼補家用⁶，是很典型的華人社群的受雇者、臨時工和小販，為那些有錢、有店面的華人工作，呈現了華人移民社群因不同的移民身份而階層化的現象。

在加爾各答華人的分類同時是以方言和祖籍地⁷，分為客家人、湖北人和廣東人，職業也分為三個群體：廣東人多從事木匠，湖北人是牙醫業，客家人則主要從事皮革製造業。當時屬於第一波移民來自於廣東的木匠因從事為殖民長官英國人服務的工作最為富有，而最窮的是避難過來的客家人。廣東的木匠在 1962 年中印戰爭之後，因為工作地點部分在港口船塢被印度政府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

⁶ 訪談記錄二。

⁷ 早期海外華人以「方言幫」和「地區幫」的社會結構為分類基礎，直到二十世紀之後華語在中國普遍流行以及華語成為華文學校教學語言之後才產生改變，但以方言或地區分類的影響仍然在各種聚居地區、社會交往、職業分布、或通婚等模式中展現出來（李恩涵 2003：22-26）。

的顧慮，所以大多必須離開加爾各答，被遣送回到中國或逕往加拿大遷居(Liang, 2007: 405)，原來與製革業具有同樣經濟地位且樂觀遠景的木廠業遂趨於沒落。

湖北人在印度從事鑲牙業的淵源來自於印尼爪哇(Java)的華人，據說在 1897 年湖北籍華人受業於爪哇歐洲人的牙科醫院，之後在當地開設鑲牙館並擴展成一千多家的華人牙科業。二次大戰期間，印度成為盟軍東南亞的後方，印尼華人部分避難印度而傳入牙醫業，當時全印度有三百多家，加爾各答市內就占了八十餘家。為了增進業務，鑲牙業者必須到不同的村落主動找尋病患，一個村落通常停留數日，然後繼續前往其他村落，所以遍佈印度各地，通常攜家帶眷一起行動，這份專業就以學徒方式教給下一代(Liang, 2007: 407-408)。該行業在 1960 年代就趨向沒落，主因是印度政府在 1947 年獨立後公布管理牙醫法令，要求開業的牙醫師要有正式牙科醫院畢業證明書或印度政府衛生署檢覈合格證明，雖然透過陳情方式得到寬限，但已經使得多數設備簡陋不合標準的鑲牙館停止營業（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62：49-50）。

同屬於第一批移民加爾各答的製鞋業，主要來自於廣東梅縣的客家人。在二次大戰以前有一百多家，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因為外貨來源告缺使得需求旺盛，而增加到一百四十多家。由於皮革是製鞋的主要原料，加上有利可圖，所以在 1910 年間，加爾各答開始有客家人從原來的皮鞋商店街搬遷到加爾各答市郊的塔壩從事皮革染整的工作，也只有這些最窮的客家人才會從事這種高污染的工作（請見附圖一）。根據 Liang 在當地的訪談指出，塔壩的居民的特徵是「帶病的膚色，瘦弱而疾病叢生的身體」(2007: 406)。華人的皮廠開始還是以傳統的手工方式製皮，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機會向戰後準備還鄉的歐洲人購買廉價的機器，加上許多歐洲皮革大廠因戰後歐洲貨幣的波動而倒閉，相繼幾家印度皮革公司也失敗之後，以中小企業經營形式的華人皮革廠漸漸地取代了歐洲人和印度人大廠的市場。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部分的印度皮革廠受到政府徵召為國防所需生產，而給了小型家庭經營的皮革廠一個攻占印度國內市場的機會，同時也接收了以前只給大廠的英國上等高級皮鞋的皮革訂單，創造了客家人皮革業的擴張的契機(Oxford, 1993)。根據《印度華僑志》(1962：42)的資料，當時在印度華人的經濟活動規模，以製革占百分之二十八，製鞋占百分之二十，最為重要，鑲牙和木工各占百分之十而已。其他還有雜貨業、洗衣、理髮以及餐館業，但所佔份

量並不高。

三、社會隔離的「他者」

(一) 敵國之民：印度國族建構的種族化

自從楊大釗以來，華人移居加爾各答或來往印度各地並沒有特別的限制，可以自由地出入，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1941 年之後才要求入境必須持有本國政府護照。入印之後可自由旅行、居住、經商工作、從事各種行業不受到政府任何管制。從表一的資料可以看到在印度的華人人口一直持續地成長，1959 年印度政府聲稱當時全印度的華人約三萬名（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62：36），在加爾各答就占了一萬五千人。

表一、華人在印度加爾各答的到 1971 年為止的人口統計

時間	人口	出處
1837	362	(Alabaster 1975[1858]; Singa 1978)
1858	500	Alabaster, 1975[1858]: 136
1876	805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Town of Calcutta 1876:22
1901	1,640	Census of India 1931, 1933 Vol. 6:112
1930	3,542	Census of India 1931, 1933 Vol. 6:112
1951	9,214	Census of India 1951, 1953 Vol. 1:18
1961	14,607 15,740	Census of India 1961, 1964 Vol. 1 part 2c[ii] :149 印度華僑志 1962：38
1971	11,000	Census of India 1971, 1975 Series1, part 2c[ii] :70

資料來源：主要整理自Oxford根據印度官方統計的資料(1993: 74-77)

中華民國成立以後，移居印度的華人持有中華民國護照，是在印度居留的外籍人士，到了 1949 年之後有些拿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有些則還持有之前國民政府發的護照，有些在印度出生的人則成為無國籍的人。1949 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度是率先承認的國家之一，印度的華人被視為中國的人民(Sen, 2005)。根據印度在獨立後制訂的憲法，以新憲法生效的 1950 年元月為準，1950 年一月以後出生在印度的華人可以自動成為印度的公民，至於出

生於 1950 年之前的人，即使不是出生在印度也可以透過申請獲得公民權，那些無法通過申請者被視為無國籍(stateless)，以授與身份證明書(Certificate of Identity) 給予居留的狀態，但必須每年到外籍人士事務辦公室申請超過 12 月的居留權。

然而中國和印度在 1962 年的邊界戰爭，雖然只歷經十天就停火，但卻造成華人在印度的命運產生鉅變，華人銀行、學校、商店紛紛被關閉。持中國護照的華人必須定期到當地安全部門登記註冊，彙報情況，外出也必須得到當局的批准。中印關係的交惡使得在加爾各答的華人受到印度的敵視與長期監控，人身自由和發展機會受到極大限制，很多人陸續離開印度，到歐、澳美洲等第三國，這是造成華人在當地人口減少的關鍵因素之一(Basu, 1985:47-55)。

中印戰爭之後，所有在印度的華人被定義為外國人，即使已經成為印度公民也被褫奪權利，成為來自於敵對國家的外人，有些被關到集中營，有些被強制驅逐回中國，有些人就地被嚴密監控，也有的人往其他第三地區如台灣、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地，在 1962 年到 1967 年的中印戰爭後續期間，全印度的華人被印度政府強制驅離有 2,395 人，自行離開印度者有 7,500 人(Banerjee, 2007)。當年還是八、九歲年紀的黃女士回憶被關在西部沙漠 Rajasthan 集中營的經驗：

「那邊很熱，因為是沙漠的地方。那時候有很多中國人在那裡，大概一萬多。船來了三次把中國人帶回中國去，因為很多人說不要在這裡住。那時候就大概六七千人走掉了。...我有很多的朋友都去加拿大，因為他們有難民的身分。我也是在 1969 到 70 年的時候申請去加拿大。我已經想好了，表也填好了。我什麼都準備好了，可是我媽媽就說你去那裡一個人不好，我們在那裡又沒有人，家裡又不是說很有錢，沒有人會幫你的。可是那時飛機票要六千多。我爸爸媽媽拿不出來那我就沒去了。」⁸

到了 1971 年間全印度只剩下兩萬華人，加爾各答只有一萬一千人。華人在 1950 年元月之前在印度出生的人卻得透過申請取得公民權，並受到百般的刁難，例如不會寫印度文也是一種理由，但印度人本身有相當的比例的文盲，顯然華人所受的是特殊待遇(Oxfeld, 1993:84-85)，這已經不是種族歧視而是國族敵視。

中印戰爭顯示印度國防軍力的不堪一擊，面對這種國家的恥辱，印度政府製

⁸ 訪談紀錄六、七。

造「反中的民族主義」(anti-Chinese nationalism)將指責的對象朝向啓動戰爭的中國，一方面維持國內的團結，另一方面也避免因戰爭失利所帶來的政治後果。在當時印度的政府檔案文件的論述中，定位中國是亞洲帝國主義的侵略者，印度是和平與自由的保衛者，有著崇尚非暴力、實行民主、利他和誠實的德行。將對立拉高到道德抽象層次，面對中印邊境軍事戰力的懸殊以及印度戰敗的事實，就有了合理的解釋。

「從中國共產黨與其鄰邦關係的紀錄顯示，當前中國的統治者是為了重現中國帝國主義所失去的榮耀。但和原先帝國主義不同之處，當前的中國政權將自己的詭計藏在大聲表白的友誼和善意之下，...基本上中印的衝突是印度的生活方式和中國共產黨意識型態的對立。就如尼赫魯總理所言，印度的政策所呈現的生活方式和中國的意識型態對權力的追求以及使用暴力達到私利的手段是完全格格不入的」⁹

在印度政府的國族論述中，中國運用陰謀與偽善發動殘忍的戰爭，完全是印度本質的對立面，所有定居在印度的華人，包括具有印度公民身份的人，系統性地被視為是印度「他者」，外表的膚色與長相連帶著內在的價值觀和信仰的差異。即便印度內部有階級、種姓等差異，透過對「他者」的界定，印度的國民代表著在國家之下共通的基礎(Banerjee, 2007)。於是印度境內的華人被種族化，連原有公民權利也被褫奪，成為敵對國的外人(alien)。已經成為印度公民的華裔印度人發現自己在已經定居的家園變成敵國的國民、被污名化的種族，也再次成為政治難民被迫或面臨是否要移往他國的抉擇。

⁹ 原文如下：“Communist China’s record in its relations with neighbour shows that the present rules of China are out to revive the vanished glories of Chinese imperialism. The difference is that, unlike the earlier Chinese imperialism, the present-day Chinese regime is seeking to hide its subterfuge behind loud professions friendship and goodwill.... Basically,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is a clash between the Indian way of lif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 As prime Minister Nehru has put it, Indian policies represent a way of life which is anathema to the ruling Chinese ideologists with their faith in power and violence as an instrument of benevolent change.”摘自Banerjee, Payal. 2007. "Chinese Indians in Fire: Refractions of Ethnicity, Gender, Sexu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Post-Colonial India's Memories of the Sino-Indian War." *China Report* 43:437-463.所引自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Publication Division (MIBPD), 1963, *The Sino-Indian Dispute: Questions and Answers* (Delhi: GOI press)

(二)、製革業者：種姓社會的邊緣化

中印戰爭改變了印度華人的命運及華人社區的生態，加爾各答的廣東木工大多被迫離開印度，湖北的鑲牙業除了牙醫法的規範之外，也無法自由地到印度各村落行使業務。在塔壩的客家人並沒有全部被關到集中營，而是就地被嚴密的行動監控，並且繼續皮革廠的事業維持生計，雖然慘澹經營也安然渡過。中印戰爭並沒有摧毀他們的事業，反而讓客家人皮革產業的資金有能夠積累朝企業化發展，這是一種非預期的結果。1962 年之前，在印度的華人都還要將錢匯回廣東的家鄉，無法積蓄更遑論有剩餘資本投資經營，但中印戰爭之後完全切斷了和家鄉的聯繫，塔壩的客家人開始能夠存錢累積資本，擴大經營的規模。1970 年代又逢來自於蘇聯與東德等國家需要大量生牛皮製作手套的機會，造就了塔壩的皮革製造業的榮景(Oxford, 1993)，此外，處於印度種姓社會邊緣化而隔離的位置也造就該經濟產業的發展空間。

定居在印度的華人尤其經過印度國族建構而被種族化的結果，系統性地被視為是印度「他者」，成為定居印度的「外邦人」，與當地印度人的關係幾乎只限於經濟上的關係，少有其他領域的交流和社會性的交往。印度人對於華人的印象來自於所從事的職業和其經濟活動的內容，像是木匠、鞋匠、製皮業者、鑲牙師、洗衣業者以及理髮師等，這些工作在印度的種姓社會當中都屬於賤民階層的工作(Sengupta, 1993: 44-45)。在印度種姓的分類觀念中，分為純潔與不潔，並以此來定義該社會分工的勞動體制和職業的貴賤，任何生物體所產生的廢棄或排泄物都被視為不潔，所有處理與這些不潔的部位和物品都屬於會產生污染的部分，根據不潔的程度形成印度種姓社會的階層化，所從事的職業是由出身所處的種姓所決定，且終身不能改變（朱明忠、尚會鵬，2003）。

由於種姓制度所體現的價值觀將勞動和從事勞動的人劃分為潔淨和污穢，凡是處理人類的廢棄和排泄物的職業例如清潔工、理髮師、洗衣工等就比不會接觸到污穢物的教士低下很多。當印度人用種姓制度的邏輯對照到加爾各答華人的職業，像是湖北人的鑲牙業、廣東人的木匠，還有客家人所從事的理髮業、製鞋和皮革業加以排序，客家人的皮革業顯然是處於最底層的地位，因為要接觸到死去的牛隻和整張牛皮，更何況牽涉需要宰殺到印度教最神聖的動物，而從事於這些不潔工作的場所就是「污穢」、「罪惡」之地。

客家人皮革業集中在塔壩地區就處於加爾各答都市的沼澤郊區邊陲地帶，類似於印度村落中賤民社區的邊緣性所在，這個地區處於都市東部外圍的垃圾場附近，即是傳統上處理皮革的賤民種姓所居之地。其實，現在的塔壩地區原來是一片沼澤泥濘無人居住的荒地，是由客家人胼手胝足所堆填出來的新生地¹⁰，附近有充足的水源提供製皮過程所需，也不必排擠到原有印度人的居地而引起族群衝突。從地理上所處的邊陲性，以及職業的低賤性，客家人的皮革業者比加爾各答其他的華人群體更處於印度社會的邊緣，除了所雇用的工人，皮革的買者等生意上往來的需要外，就只有華人會出入塔壩地區，地方官員更不願意來到這個污穢之地遭受「污染」，因此製皮過程的污水排放並未受到任何的處理與官方的干涉，使得塔壩地區成為客家人皮革業一塊被隔離的化外之地。

客家人的皮革業與印度社會的關連性建立在經濟的關係上，並沿著印度社會語言、種姓、宗教和區域等類別所形成的產業結構進行，他們必須向在北印度的穆斯林購買生皮，雇用來自於鄰近的比哈(Bihar)省分賤民種姓移工，警衛則是雇用尼泊爾人(Nepalese)擔任，製成的皮革銷往印度西北旁遮省(Punjab)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錫克教徒(Oxfeld 1996)。儘管有很明顯的社會區隔，客家人的皮革業卻是印度皮革產業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因為處理到動物的屍體，一般高級種姓階級根本不屑於從事皮革業這類污穢的工作，而從事這類工作的賤民缺乏資源而無力企業化。於是塔壩的華人從印度種姓體制的結構「利基」下發展出提供印度全國市場，進而運銷歐洲、中東等地的皮革產業。隨著市場需求的增加，到了 1960 年代，大小製革廠約有二百餘家，華人從業者有三千多人，這時的皮廠雇用在地的華人和客家人，並雇有印度工人約二千餘人（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62：44-45）。1970 到 90 年代出口到蘇聯的貿易帶來繁榮，造就塔壩製皮廠的黃金時代，隨著家族傳承到第二代以及個人創業而達到三百家之多的全盛時期，這些皮廠每天處理三萬多張水牛皮，占印度全部皮革生產的五分之一(Basu 1985)。然而因為長期市場集中在蘇聯的單一式樣大量生產，雖然從中賺取厚利，卻無法創新和多樣化以因應印度國內本地與全球皮件的需求，而在蘇聯解體之後，漸漸地失去市場上的競爭力。由於加爾各答都市空間發展往市郊擴張，開始嚴格的環境規定，原來被隔離的塔壩從化外之地變成

¹⁰ 訪談記錄五。

新興開發區域，高污染的製皮場被當地政府要求限期搬遷到新的工業區，2002年印度的高等法院對塔壩的皮廠作出必須搬遷的最後判決，使得這裡的皮廠無法繼續經營下去。

四、成爲印度的少數族群

製皮廠是當地客家人的命脈，雖然當地政府還沒有徹底執行遷廠的命令，但已引起大家對經濟前景感到憂慮，使得很多家庭只留部分家人在此勉強維持製皮廠生意，其他人則移民海外，根據當地塔壩青年會(South Tangra Chinese Youth Club)吳會長所提供的資料，當地人口的數量在公元 2000 年之前還有 2,500 人，2001 年是 2,100 人，2004 年是 231 家戶，1,394 人，而在 2006 年則剩下 210 戶，1,129 人¹¹，使得塔壩成爲這些移居海外客家人的僑鄉。塔壩的產業變遷也產生了結構的變化，2006 和 2007 年印華文化發展協會的電話簿統計¹²，在加爾各答的製皮廠只剩下 56 家，皮鞋店也剩下 60 家，塔壩地區的餐館，十多年前還不到 20 家，隨著一些皮廠的搬遷、關門和歇業而有增加的趨勢，形成了一條中華美食街（參見表二）。西元 2005 年在塔壩社區入口處豎立了一個書寫著「塔壩中國城」幾個中文、英文“Tangra China Town”加上印度文和孟加拉文的大塊看板放在社區的入口處，指示著進入塔壩的方向。這個長期和加爾各答城市與印度社會隔絕的社區，首次正式而主動地向其移民的印度社會介紹自己，希望被「看見」，從而能夠成爲印度社會多元族群的正式成員。

表二、2006-2007 年加爾各答華人產業統計

廠商個數 華人產業	家數（加爾各答）	加爾各答/全印度家數	
製皮廠	56 家	56/56	100%
皮鞋店	60 家	60/69	87%

¹¹該會因爲主辦過年的慶典活動，每年固定向當地每一個家戶按人口數、不分男女的收取定額捐款做爲經費，類似臺灣地方宗教活動「收丁錢」的意義。吳會長從 1995 年開始建立當地的家戶丁口紀錄以作爲收取捐款的依據，也成爲紀錄當地人口變化的寶貴資料。

¹²該份調查資料的內容涵蓋全印度華人的企業，比對 2006 和 2007 年兩年的資料，在數字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因採取自願登記的方式，顯然不會完整，但至少提供我們觀察當地華人基本產業的結構。

中餐廳	53 家	53/88	60%
美容院	29 家/31 家	29/62* ; 31/63	47% ; 49%
牙醫	9 家	9/26	37%
其他行業**	23 家		

資料來源：The Indian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Culture, Welfare and Development，2006 與 2007 年，*The Indian Chinese Yellow Pages*，Tangra:印華文化發展協會。

*2006 年這 62 家美容院當中在加爾各答的有 29 家外，20 家在 Bangalore，其他城市有 13 家。

**其他類別的職業包括醬料百貨家，電腦公司 1 家，醫生 3 家，乾洗店 3 家，手藝店 2 家，室內設計和家具，木廠 7 家，皮料化學 3 家，報紙一家，照相印刷 4 家。

(一) 塔壩的客家華人

在現代民族國家興起之前，海外華人所認定的歸屬並不是「中國人」，而是他們的家鄉，塔壩社區的華人大多是來自於廣東梅縣移民過來的客家人後代，Oxfeld(1996)根據她 1980 年代在塔壩的田野研究指出，塔壩的客家人兩百年來即使在印度傳衍數代，依然保存著「客家」的認同，主要是印度國家的政策、族群職業專門化與層級化的經濟，以及建立在純潔和污穢象徵體系為主的種姓社會使得這些客家人被種族化和邊緣化，持續與印度社會相互隔離，從而構成維護客家認同的再生產機制，這部分詳細描述了「他者指定」構成少數族群的作用。

與印度社會的隔絕也同時強化了塔壩客家人的「自我認定」機制。當研究者在公元 2007 年到該社區進行田野，這個客家身份認同在日常對話或正式訪談中經常會有塔壩的客家人主動提到「保守」的族群特色。他們很具體地指出「保守」是對當年移民所帶來的客家文化傳統原封不動的傳承保留，特別強調客家話的部分，雖然在印度的客家人口數量上比在其他國家的要少，但這裡的客家人自認比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客家人講的客家話還要「正統」，甚至比梅縣「老家」所保留的還要純正，由此可證這裡是「全世界最正統的客家人」：

「這裡比較保守。可說是跟以前一樣，過年，過節，拜拜，什麼都完全一樣」¹³。

「我們這邊的客家話可以說是最正統的，因為梅縣的很多人出去打工會

¹³ 訪談記錄一。

來後都講普通話。我們這邊的梅縣話最保存。」¹⁴

「我有回過我老家五次。這裡的客家人回了我們老家，他們不敢相信我們是印度出生的。我第一次回祖家是 1986 年，我第一次見到我的親人，所有的親人都感覺到非常驚奇。我們講的客家話還沒有變，...因為無論是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的客家人都不會講客家話了，都變了。...世界各地我們印度的客家人是第一。因為我們這裡比較保守。我們客家人裡面相互通婚，像東南亞的他們都跟當地的人結婚」¹⁵

訪談中許多個案都有提到回到廣東梅縣的老家的經驗¹⁶，不管是否還有親戚在那裡，一樣都會帶著子女回老家尋根溯源不忘祖先家園，除了少數沒有家人的老者回去梅縣定居終老之外，居住在塔壩的華人並沒有回老家歸根的打算。雖然「自我認定」以原鄉老家標記著客家本質的共同起源，但透過強調族群內部通婚和客語口音保存，這些居住在塔壩的客家人自我區分與其他客家群體的差異，並從語言的保留宣稱比梅縣老家更「正統」的地位，於是這個客家群體雖然人數不多但很有自己的客家特色¹⁷。

這群「最正統的客家人」也發展出具有印度在地特色的客家認同，透過共同擁有集體記憶使團體成員擁有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感受，形塑命運共同體。集體記憶可以透過文本書寫的形式，將某些社群希望其成員記憶的「事實」加以凸顯，表現的形式可以是神話、紀念館、國定假日或相關的儀式活動，透過書面、慶典、節日和儀式的方式，集體記憶維護社群成員集體而非個人身份認同，因此是一種社群的記憶(Halbwachs, 1992; Zerubavel, 2003)。被稱為是「孟加拉省的第一個中國企業家」¹⁸楊大釗的傳說就扮演了這種功能。

雖然楊大釗在 1778 年來加爾各答定居，1783 年 12 月在自己的糖廠去世，即使糖廠和資產都被英國政府拍賣，但他被當地的華人視為是移民印度的第一人，關於他的事蹟有許多傳奇的成分：例如他從廣東航行到加爾各答過程中，被

¹⁴ 訪談記錄五。

¹⁵ 訪談記錄四。

¹⁶ 經過中印戰爭之後完全與家鄉隔絕，直到 1980 年代之後政治氣氛改變之後才有機會回鄉。

¹⁷ 族群界線經常是浮動而相對的，相對於印度社會而言，塔壩的客家人宣稱自己是 Chinese，但為何塔壩的客家人在此時刻意與其他客家族群區分，甚至和梅縣老家爭取正統地位，其相對的目標應是和中國近年來對海外華人政策的積極性有關。

¹⁸ 這是根據陳美華（2001：495）在當地取得的資料。

英籍船長指控夾帶兩名偷渡者，結果這兩個人卻神奇地變成普通的木材，楊大釗才發現這兩個人其實是神明，後來就在上岸的地方為他們建造一座寺廟(Oxford, 1993: 71)。這個例子將楊大釗賦予了神秘的色彩，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到印度來定居是神明的指示並也被神明庇佑。另一個例子是有關楊大釗在向當時英國總督 Warren Hastings 要求土地的時候，Hastings 答應給予的範圍是楊大釗一天內騎馬所到的範圍，但他低估了楊大釗的能力，結果楊大釗獲得了約 260 英畝的土地¹⁹，每年的租金是 45 盧比(Liang, 2007:398；Li, 2006:105-106)，Oxford 指出這是被當地華人一直傳頌且眾所皆知的故事(Oxford, 1993: 71)。這個故事有另一個版本，在台灣的僑委會所編纂《華僑志總志》(1978：649)中記錄的是：「中國人楊大釗，因為無力繳交當地的『入境稅』，未能登陸，幸而尚有一包茶葉，獻作禮物，立受歡迎，並受當地政府酬與一片荒地。此一荒地，在印度人視之，則為棄地，而楊氏得之，正合拓荒理想，當即欣然接受，芟荆斬棘，闢為蔗田；昔日荒蕪，瞬成沃土；為當地擴大生產，繁榮經濟。華僑開發之力，每每如此。印度既有此一嶄新天地，華僑接踵前來者日眾，而印度之墾荒面積，遂為之擴大。...印度人與我僑胞為紀念當日之墾拓先鋒—楊大釗，至今仍名該地為『阿釗坡』，並立廟奉祀。」華人在阿釗坡(Achipur)逐漸發展，但在 1900 年左右遭到當地印度人覬覦而產生動亂，楊氏後裔多數在此變亂中失去生命和財產，自此阿釗坡由甘蔗田園轉為當地人民的農莊（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62：119-120）。

因為透過代代口傳，這些故事出現不同的版本，但共同點是楊大釗是拓荒的先鋒，開啓華人在印度的建立家園的先例，重點不在於這些故事的真實成分，而在於這是加爾各答華人在印度的集體記憶創造，確立楊大釗的「開印祖」地位。他的墳墓位於加爾各答市南郊 25 公里處胡格裏河(Hooghly River)岸的小村邊，後人立有廟宇「塘園伯公」，已經成為加爾各答華人的一處聖地，每年農曆春節都會舉家前來祭拜。「開印祖」不只是一個過去的歷史，也是塔壩客家人對其社群在印度社會的現實投射，楊大釗足智多謀、膽識過人，赤手空拳建立家園事業，是在印度創業經營的華人企業家所想像的典範。透過每年固定時間的集體祭拜，再次凝聚社群的認同與理想形象，也是塔壩的客家人與其他海外的客家人區別的一個標記。

¹⁹ 根據 Liang (2007：398) 的資料，是印度土地單位 650 bighas 的面積，2.5 bighas 相當於 1 英畝。

(二)「塔壩中國城」

由於中印戰爭的影響，歷經被印度政府監禁與監視的經驗，以客家人為主的華人在印度基本上自我隱形與對外隔絕的，工廠與住家在高牆之內，皮廠的經營屬於非正式部門的方式運作，更不願意過度醒目而招惹官方的注視。印度政府也有意忽視塔壩移民社區的存在，高度邊緣化的方式無為而治。塔壩的開發由客家人填土整地從原來是一個大水塘變成一個生產和生存聚落，沒有任何來自官方的基礎建設，道路的修築全由客家人自己出資整理，個人修整自家門範圍的路段，維修也視個別經濟狀況而定，區內的道路柔腸寸斷高低起伏是常態²⁰，排水溝渠、路燈乃至垃圾清理等基本設施服務，全由華人自費興建和清理。塔壩在官方地圖上其實就是一片空白的區域：

“No roads are marked. Only the surrounding roads are marked. In Tangra there’s nothing. There are no water supplies. They are not supplying water and we are paying for it. There is no existence then why they supply the water. If there is water supply then that area should be legal.”²¹

這種視而不見，置之不理的對待方式，卻某種程度給了塔壩客家人自主的生存空間：「在印度我們生活很輕鬆。你要做什麼印度政府都眼睛閉著給你做的。如果在外面，我這個小小的廠時不能夠開的。」²²

現在塔壩的居民經營餐廳就必須宣傳這個地方的存在與特色，除了登廣告之外，還開始積極地立碑標示「塔壩中國城」，面對當加爾各答城市都會發展，塔壩從郊外變成城內而面臨可能被整建的命運，這個立牌的舉動更代表著華人社群宣示自己存在這裡的具體事實，而非如地圖上的空白一片，這裡具有文化與提供觀光服務的功能，不應該也不能輕易將這個地方特色改變。中國城所扮演的不單

²⁰研究者近年有機會造訪印度幾個都市，對於坑洞崎嶇的道路司空見慣，但印度也是一個舉行選舉的民主國家，尤其一到地方選舉，政治人物為了爭取選票還是會回應地方的要求，因此道路是否平整也反應官方的重視程度。在 2007 年夏天雨季即將來臨之際，研究者首度踏進該社區，大雨過後的街道泥濘難行，對於在人口如此密集的住家所在，有這樣的環境還是覺得不可思議，故理所當然地向當地人士詢問是否曾經向政府官員或透過地方民意代表反應道路的問題，畢竟這裡的居民是有選票的，這部分田野所得的資訊，真實地反應該地長期被忽視以及居民政治弱勢的處境。

²¹訪談記錄八。

²²訪談記錄一。

只是提供族群認同來源的角色，也是一個抗拒被排除和歧視的力量所在。

“They can take this area away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They can take the area away. That’s why I put up the road sign. I put it this way: we are Indians, this citizen but culture is Chinese and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going to Tangra to go to the restaurants.”²³。

文化地理學者指出在美國和澳洲地區的中國城並非只是單純的華人聚居之地，而是在歐洲文化霸權下將地理區位以種族化的方式呈現，也是華人與當地社會族群互動在時間和空間相互作用所展現的權力關係與表現，因此中國城的特色也隨著所在的社會與歷史脈絡而有所不同(Anderson, 1988)。其實最早以講粵語廣東人居多的華人移民聚居之處的 Bowbarzar 舊中國城區，提供當時的英國人和印度上層人士需要的訂製皮鞋、精細的木工，洗衣店還有牙醫診所等服務，該地最有名的「鞋街」(shoe street)，與印度的消費者是有著多樣的經濟交換功能。中印戰爭之後鞋街漸漸沒落，華人聚居到以客家人經營皮廠為主但對外隔絕的塔壩地區，在國家政策和種姓社會的分類下和印度社會保持著相當的距離。但現在轉變成中華美食街的塔壩中國城，則打破了過去隔絕的社會藩籬，今年五十歲的藍先生指出這種差別：

「我還記得我很小的時候，那時候的印度人，如果你拿一個桶去街上裝自來水然後稍微碰到他的桶，他就會把全部的水倒掉，再將水桶洗乾淨。他們說你們中國人什麼都吃的，狗也吃，很髒！現在他們都吃我們中國人的菜，吃得津津有味。以前碰到一點他們的東西都不行，現在還吃我們煮的菜，還很愛吃。」²⁴

因為都市發展範圍擴大，過去的邊陲成為新興的城鎮，以前沒有人要的廢棄地現在是炙手可熱的房地產，塔壩地區已經被納入加爾各答都市擴展的範圍，原來高度污染皮革廠突然變得十分醒目而刺眼，而都市更新區位所帶來的價值更使塔壩成為不同的利益團體垂涎的對象。在官方的地圖與政策上，塔壩原來就是一塊沼澤廢棄地，是沒有道路建設的空白之地，邊緣化與隔離的結果使得塔壩的華人社區處於脆弱而無力抵制外來壓力的政治經濟處境，當 2002 年的高等法院裁

²³訪談記錄八。

²⁴訪談記錄一。

決皮革廠搬遷的法令時，許多人認為已經宣示了塔壩華人社區將成歷史陳跡的命運(Karkaria, 2004; Liang, 2007)。但這個社群開始積極地從隱形的狀態以強調特有的族群文化而再現，試圖擺脫被忽略的邊緣位置，透過「塔壩中國城」體現其社會經濟價值之所在，凸顯共同參與構作加爾各答都會城市地理的歷史。即使當地政府的觀光事務部長贊同將塔壩發展成觀光景點的想法，當地政府也還沒有實質的計畫與財政預算編列²⁵，一個中國城的標示代表的卻是一個轉捩點，不只是一個路標而是保存塔壩社群的一個策略，也是塔壩客家人重現展現自我並重新建構與印度社會的關係。

五、結論

本文所探討客家人移民印度加爾各答兩百多年的歷史與身份變遷，是一個從移民過程到形成少數族群的發展過程。移民到定居加爾各答的歷史同時受到中國和印度國內情勢與兩國外交關係的影響，歷經印度社會從帝國殖民地統治到獨立建國，中國的歷史從清末帝制、民國成立、到國共內戰，印度與中國的關係從反帝的同志到侵略邊界的敵國，而使得同一移民族群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移民身份，並面臨著被迫或思考是否要前往第三國的選擇。加爾各答客家人從移民到定居的人口組成與變遷，同時是內在動力和外在制度環境共同構作的結果。

移民過程的最後一個階段是當移民者形成一個世代定居且形成一個特定的族群團體，但結果卻依其所在的社會制度而有別。在加爾各答的客家人作為一個印度少數族群的認同，一方面是被主流社會團體透過排除或邊緣化的過程所構成的「他者指定」，例如種族化成為印度的敵國之民，以及職業上被隔離在種姓社會的邊緣，另一方面也透過客家語言的保存、宣稱客家「正統」的地位，以及認定「開印祖」的歷史與文化的經驗基礎，形成共同屬於一個社群的集體意識，成為「自我認定」的產物。這兩種認定在不同的制度脈絡下對少數族群的身份產生不同程度的作用。也因此加爾各答的客家人在面對印度社會時宣稱自己為 *Indian Chinese*，但又同時相對於包括老家在內的其他客家族群，凸顯其客家本質的特性，以及 *Tangra* 的認同，顯示多重認同共存而不衝突，但卻不能相互化約，將

²⁵ 中央社 2007.07.19

其概括為海外華人(overseas Chinese)。

本文針對塔壩地區客家人從移民印度兩百多年後一個新興中國城的出現，這個社群開始積極地從隱形的狀態以強調特有的族群文化而再現，試圖擺脫被忽略的邊緣位置，並試圖在印度以少數族群的身份加入其多元種族與宗教的社會，凸顯了客家人移民印度歷史的複雜脈絡，被現代國家壓迫下弱勢族群的境遇，以及族群再現的機制與制度基礎，說明印度塔壩客家人從過客到定居而成為印度社會少數族群的轉變過程，也填補了華人移民南亞在文獻上的部分空白。

Map of Calcutta



附圖、加爾各答城市地圖

<http://www.indianholiday.com/maps-of-india/map-of-kolkata.html>

附錄：訪談資料

錄音編號	受訪者 (化名)	性別	行業	移民代別	訪談時間/地點
1	藍先生	男	(小型)製皮廠	二	2007年7月29日 在 Trangra 的住家
2	林女士 藍老太太	女 女	美容院師傅 林女士的婆婆	二 一	2007年7月29日 是個案一藍先生的 親戚，該訪談地點在 藍先生家中
3	James	男	鞋店經理	三	2007年7月29日 是個案一藍先生的 親戚，該訪談地點在 藍先生家中
4	李先生	男	製皮廠	三	2007年7月30日 在李先生 Trangra 的 住家
5	鍾先生	男	中型製皮廠	二	2007年7月30日 訪談分別在 Trangra 的住家、製皮廠以及 Bantala 的工業區的 製皮廠
6/7	黃先生 黃太太	男 女	餐廳	二	2007年7月30日 在黃氏夫婦 Tangra 經營的餐廳
8	Chen	男	退休教員	二	2007年7月31日 在 Park Street 的家中
9	莊先生 莊太太	男 女	點心攤	二	2007年7月31日 在 Tangra 市場邊所 經營的點心攤
10	劉太太	女	餐廳(一邊皮廠 出租一邊餐廳)	四	2007年8月01日 在 Tangra 經營的餐 廳
11	吳先生	男	餐廳	二	2007年8月01日 在 Tangra 經營的餐 廳
12	Eric.	男	W 鞋店	三	2007年8月02日在

					Shoe street 的鞋店
13	孫先生	男	餐廳		2007年8月02日在 孫先生 Tangra 經營 的餐廳

參考書目

- 朱明忠、尙會鵬著，2003，《印度教：宗教與社會》。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李恩涵，2003，《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
-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62，《印度華僑志》。台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 _____，1978，《華僑志總志》三版。台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 陳美華，2002，〈印度加爾各答的客家人：一個田野筆記〉。收於《海外華族研究論集 II：婦女、參政與地區研究》，張存武、湯熙勇主編，頁 485-505。華僑協會總會出版。
- Anderson, K. J., 1988, "Cultural Hegemony and the Race-Definition Process in Chinatown, Vancouver: 1880-1980." *Society and Space* 4:127-149.
- Banerjee, Payal, 2007, "Chinese Indians in Fire: Refractions of Ethnicity, Gender, Sexu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Post-Colonial India's Memories of the Sino-Indian War." *China Report* 43:437-463.
- Basu, Ellen Oxfeld, 1985, "The Limits of Entrepreneurship: Family Press and Ethnic Role amongst Chinese Tanners of Calcutta." i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 Berjeaut, Julien, 1999, *Chinois a Calcutta: Les Tigres du Bengale*. Paris: L'Harmattan.
- Castles, Stephen, and Mark J. Miller. Eds., 2003,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Dhar, Sujoy, 2000, "Time's up for Calcutta's Chinese" in *Asian Times Online*.
- Halbwachs, Maurice,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rkaria, Bachi, 2004, "Bell tolls for China Town." in *The Times of India*.
- Li, Kwai-yun, 2006, *The Palm Leaf Fan and Other Stories*. Toronto: TSAR Publications.

- Liang, Jennifer, 2007, "Migration Pattern and Occupational Specialisations of Kolkata Chinese: An Insider's Story." *China Report* 43:397-410.
- Majumdar, R.C. H.C. Raychaudhuri, and Kaukinkar Datta, 1960, *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 London: Macmillan. (李志夫 譯 1981,《印度通史》,台北:國立編譯館)
- Marx, Karl, 1858, "Trade or Opium?" i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ew York.
- Observer, THE, 2004, "Calcutta's Chinatown facing extinction over new rule." Pp. 5 in *THE OBSERVER*. London.
- Oxford, Ellen, 1993, *Blood, Swea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6, "Still 'Guest People' : The Reproduc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Calcutta, India." Pp. 149-175 in *Guest People: 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 edited by Nicole Constable.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Sen, Tansen, 2005, "Go For a Slight Change Of Route" in *The Telegraph*. Calcutta.
- _____, 2007, "Kolkata and China: Some Unexplored Links." *China Report* 43:393-396.
- Sengupta, Smita, 1993, "Marginality and Segregation: A Concept of Socio-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Urban Setting." *Man in India* 73:41-47.
- Zerubavel, Eviatar, 2003, *Time Map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Social Shape of the Pa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